

外国影片研究丛书

豺狼的日子

中国电影出版社

外国影片研究丛书

豺狼的日子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79 北京

*The Day of the
Jackal by Frederick Forsyth*
A Bantam Book, 1978

日本《电影旬报》杂志1973年下旬号

内 容 说 明

本书为“外国影片研究丛书”之二，内容包括英国畅销小说《豺狼的日子》、根据该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和有关影片的其他材料。《豺狼的日子》描写法国一个反动组织收买一个国际职业刺客企图刺杀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经过，情节曲折紧张，文笔生动。据此改编的电影剧本因技巧高超而获得过美国好莱坞颁发的最佳编剧奖。由于本书同时收入了小说原著和电影剧本，所以读者可以从具体的实例中学习改编技巧。本书适合电影专业人员、文艺工作者和有志于从事电影编剧工作的文艺爱好者阅读。

豺 狼 的 日 子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3 $\frac{1}{2}$ 字数：258,000

1979年11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册

统一书号：8061·1294

定价：1.60 元

编辑例言

我们现在出版的这套《外国影片研究丛书》，作为一种新的尝试，终于同读者见面了。

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书的目的，是向从事电影创作的同志们以及有志于写作电影剧本的一般读者，提供一批有参考价值的改编电影剧本，同时提供据以改编的原作或有关素材。通过这种编辑方式，读者可以对照阅读原作和改编剧本，这就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对两者进行分析研究的机会，从中看出原作和剧本在表现主题、安排情节、刻画人物和处理场景等方面的相同与不同之处；看出两种艺术手段，其中特别是电影手段的长处与局限。我们认为，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和比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似乎要比阅读一些有关改编问题的抽象理论更易于得益。

就我们所知，改编向来是电影创作的一种主要方式。自从电影发明以来，世界各国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剧本是为数极大的。这些改编的作品，其原作有的是古典小说或戏剧，有的是影响较大的现代作品，其他诸如回忆录、传记以至新闻报道等也都可以成为改编电影的素材，其范围是十分广泛的。

至于改编的结果，有的对原作做了忠实的“电影化”，即原封不动地搬上银幕；有的则取长补短或改头换面，甚或统摄原意，另铸新篇；有的大刀阔斧，删繁就简，使其线索单一，人物突出；有的则添枝加叶，大事繁衍。总之，凡是成功的改编无不都是各具匠心，妙用刀笔，形形色色，各有千秋。

然而，毫无瑕疵的样板式的模式是没有的，一成不变的艺术加工方法也不存在。我们向读者提供这套丛书，并不是想向读

者提供什么范例，也并不认为这些都是无懈可击的成功之作。我们没有对这些作品的改编技巧进行什么分析评论，这一方面是囿于水平，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给读者造成先入之见，影响读者独立研究的兴趣。

最后，必须声明的是，这套丛书中有些是文化大革命前旧书的重版，如《罗马 11 时》，有的则是新编的。特别是新编的选题，按例应当除了作品本身以外，尽量编入一些有关资料，如原作者或改编者关于创作意图或经验的文章，有关的评论以至改编影片的剧照等等，这样就可以给读者提供更多有助于分析研究的材料。但是由于我们手头几乎没有任何可供编选的资料，这十年来“四人帮”肆虐的结果，使我们原有的资料散失殆尽，而近年来的外文书刊则全付阙如。可以说，我们这套丛书的头几本在内容上显得比较贫乏，也反映了“四人帮”对电影研究工作破坏之严重。好在这套丛书今后还将继续不断地出下去，我们相信，随着各项工作的逐步恢复和开展，这种缺陷一定会逐步得到改进和弥补。希望读者热情予以批评和帮助，使我们出好这套丛书。

一九七九年春

目 次

豺狼的日子 （小说）……………〔英〕弗雷德里克·福赛斯著	
第一部 设谋篇……………	（ 3 ）
第二部 追捕篇……………	（223）
第三部 刺杀篇……………	（315）
豺狼的日子 （电影剧本）……………〔英〕K·罗斯著	
	陈笃忱译（357）
附录： 弗雷德·齐纳曼谈《豺狼的日子》	
……………	浜田容子（425）

豺狼的日子

(小说)

[英] 弗雷德里克·福赛斯著



第一部 设谋篇

第一章

巴黎，三月的一个清晨，六点四十分，天气很冷，尤其当一个人即将被行刑队枪决的时候，天气就显得更冷了。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一日的这个时刻，在迪弗里堡的大院子里，一个法国空军中校站在打入冰冷的礫石地里的木桩子前，两臂反绑在柱子上。他凝视着面前二十米处的一队士兵，慢慢地，他不再有什么可怀疑的了。

三十五岁的让-马里·巴斯蒂安·蒂尼中校用脚尖踢着砂礫，以略微减轻一下紧张情绪，他的眼睛给蒙上了布条，光明便永远消失了。二十名士兵拉开枪栓，推上子弹，在这片劈啪声中，神甫的喃喃唸经声便更显得软弱无力了。

墙外，一辆贝利埃牌卡车在拼命按喇叭，因为几辆开往市中心去的小型车辆堵住了它的路。喇叭声盖住了行刑队长发出的“瞄准”命令声。接着是一片寂静。当枪声响起时，正在苏醒的城市没有丝毫反应，只是把一群鸽子吓得噗噗地朝天飞了一阵。几秒钟后，打响的最后一枪，也消散在墙外愈来愈多的过往车辆的噪音之中了。

这个军官是“秘密军”组织谋刺法国总统的一伙刺客的首领，他的死理应结束这场谋刺总统的活动。但是，由于命运的拨弄，它却反而成为一个开端。要知道为什么，就必须首先解释清楚，为什么在三月那一天清晨，巴黎郊外军事监狱的院子里

会挂起一具弹孔累累的尸体……

太阳终于落到了皇宫围墙的后面，飘落在院子里的长长的阴影，带来了一丝令人快慰的凉意。在那年最炎热的这一天里，即使到了黄昏七点，气温还是摄氏二十五度。在这个闷热的城市里，到处都有巴黎人把怨言百出的妻子和嚎叫着的孩子塞进汽车和火车，送到乡间去度周末。这一天是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也正是在这一天，呆在巴黎城外的几个人决定：必须干掉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将军。

当城里的居民在打算到比较凉爽的河滨和海滩去避暑的时候，藻饰瑰丽的爱丽舍宫里还在继续举行内阁会议。已经在可喜的阴影下渐渐发凉的棕褐色礫石路上，停放着十六辆黑色雪铁龙牌 DS 型轿车，它们头尾相接地排成一圈，占去了院子里四分之三的空地。

司机们聚集在靠近西墙最背阴的地方，那儿阴影降临得最早。他们互相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只有那种整天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等待主人差遣的人，才会开那种玩笑。

有人更是放肆地抱怨今天内阁讨论会怎么时间特别长。直到快七点半时，一个身戴饰链、胸挂奖章的侍从官，在皇宫六级台阶顶上的厚玻璃门后出现了，他朝警卫打了个手势。有的司机把吸了一半的高卢牌香烟扔在地上，踩进了礫石缝里。大门两边，岗亭里的保卫人员和警卫都站得笔直，巨大的铁栅门打开了。

当第一批部长们在厚玻璃门后出现时，司机们已经坐在轿车的驾驶座上。侍从官把门打开，内阁部长们乱哄哄地走下了台阶，临别时互相祝愿能度过一个安静的周末。轿车依次开到台阶下面，侍从官躬身打开后座车门，部长们各自登上座车，在举手敬礼的共和国卫队面前疾驰而过，直奔郊外的圣奥诺雷区。

不到十分钟，他们都已走光。两辆长长的黑色 DS 19 型雪铁龙牌轿车仍然停在院子里，它们缓慢地开到台阶下面。第一

辆车插着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小三角旗，开车的是弗朗苏瓦·马鲁，他是国立萨托里宪警学校训练总部出身的警察司机。他生性沉默寡言，从不参加院子里部长司机们的玩笑；他的冷静果断和开车又快又稳的能力使他一直当戴高乐的私人司机。车里除了马鲁以外空无一人。这辆车后面的第二辆 DS 19 型轿车也是由一个萨托里宪警学校出身的警察驾驶的。

七点四十五分，玻璃门后面出现了另一群人，礫石路上的人们再一次挺胸立正。戴高乐身着他惯常穿的深灰色双排扣西服，打着黑领带，出现在玻璃门后面。他以老式的礼节先把伊凤·戴高乐夫人让出玻璃门，然后挽着她的胳膊，走下台阶，来到等待着的雪铁龙牌轿车旁边。他们在车旁分了手，总统夫人上了第一辆车，坐在左边后座上。将军在她后面从右边上了车。

他们的女婿，阿兰·德·布瓦西厄上校，当时是法国陆军装甲骑兵部队参谋长，他检查了一下两面后座门是否都已关好，然后在马鲁身旁的前座坐下。

陪着总统夫妇下台阶的一群官员中有两人登上了第二辆车。昂里·德儒戴是又高又大的值班保镖，是一个来自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人。他在司机身旁的前座上坐下，把沉重的左轮枪移到左面腋下，然后倒在靠背上。此后他那双眼睛就不停地转动着，倒不是看着前面的车，而是盯住一闪而过的行人便道和街角。第二个人对留下来的值班保卫人员嘱咐了最后一句话以后，独自上了轿车的后座。他就是琼·杜克雷警长，总统卫队长。

西墙旁边，两个戴白头盔的摩托车手发动引擎，徐徐驶出阴影向大门开去。他们在大门口停了下来，两人之间相距十英尺，回头向后瞧着。马鲁开动了第一辆雪铁龙轿车，离开台阶，转向大门，在摩托车警卫后面停住。第二辆车跟了上来。这时是下午七点五十分。

铁栅门再度打开，这一小队人马在站得笔直的门卫面前驶过，通过郊外的圣奥诺雷区，然后拐入德马里尼大街。在栗子

树下面有一个头戴白色防护盔的青年人，骑坐在一辆小摩托车上。他看着这小队人马驰过以后，就驾车离开便道，跟了上去。作为八月份的一个周末，交通很正常。事先也没有将总统动身的消息预先警告有关人员。值勤的交通警察只是从摩托车的警报器的尖叫声才知道这队人马的来临，他们只好拼命地又挥手，又吹哨子，才拦住了来往的车辆。

这支车队在树荫浓密的大街上加快了速度，飞快地进入了余辉犹在的克雷蒙梭广场，直奔亚历山大三世桥。那个骑小摩托车的人，紧追在这些政府汽车后面，毫无困难地跟了上去。

过了大桥，马鲁跟着摩托车警卫上了加兰尼将军大街，从那里驶上了广阔的荣军大街。骑小摩托车的在这里得到了答案——他摸清了戴高乐的车队去巴黎城外的路线。他在荣军大街和瓦雷纳街的交叉路口，把油门关小，排气管的呼啸声小了下來，他转向街角上的一家咖啡馆。到了里面，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枚小金金属辅币，走到咖啡馆后面装着电话的地方，打了一个市内电话。

让·马里·巴斯蒂安·蒂尼中校在繆东的郊外等待着。他在空军部工作，已结了婚，有三个孩子。固然他有正常的职业和家庭生活，心里却对夏尔·戴高乐充满了刻骨的仇恨。他认为戴高乐把阿尔及利亚放弃给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是对法国的背叛，是对那些在一九五八年使他重新上台的人的背叛。

丧失阿尔及利亚并未使他个人遭到任何损失，他也不是出于个人考虑才采取行动的。他自认是一个爱国者，坚信杀掉这个他认为是背叛祖国的人，是为他所热爱的祖国服务。那时，有他这种看法的人何止千万，但是对比之下，成为“秘密军”的狂热成员，非要杀死戴高乐和搞垮他的政府的人却为数不多。巴斯蒂安·蒂尼则是这样的一个人。

电话打过来的时候，他正在小口地呷着啤酒。酒吧间侍者把电话递给他以后，就到酒吧间另一头去调整电视机去了。巴

斯蒂安·蒂尼听了几秒钟后，对话筒低声说，“很好，谢谢你，”就放下了电话。他的啤酒钱早已付过了。他慢慢踱出酒吧间，走上了便道，从腋下拿出一卷报纸，小心翼翼地把报纸打开了两次。

街对面，一个青年妇女把她一楼套间窗子上的纱窗帘放了下来，转身对在屋子里来回闲荡的十二个男人说：“走的是第二条路线。”五个青年人，他们不都是老练的刺客，停止了搓手，跳起身来。

其余七个人年龄较大，也不那么紧张。他们之中有一个老于此道的人，他是巴斯蒂安·蒂尼的副手，阿兰·布格兰内·德·拉·托内中尉。他是一个极右分子，出身于一个拥有土地的绅士家庭。他三十五岁，已婚，有两个孩子。

这间屋子里最危险的人物是乔治·瓦坦。他三十九岁，宽宽的肩膀，方方的下颚，是一个狂热的“秘密军”成员。他原是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农业工程师，两年后变成了“秘密军”的一个最危险的刺客。他腿上有一处旧伤，人们叫他“瘸子”。

姑娘宣布了这个消息以后，十二个男人通过楼房的后楼梯来到了一条小街，那里停放着六辆车，都是偷来或租来的。这时是七点五十五分。

巴斯蒂安·蒂尼亲自花了许多天确定行刺地点、测量射击角度、计算开动着的车辆的速度和距离以及拦截车辆所需要的火力。他选定的地点是通向小克拉玛主要交叉路的一条又直又长的名叫解放大街的马路。计划是这样的：第一组由带长枪的射击手组成，他们在不到交叉路二百米的地方向总统的汽车开火。他们躲在停在路旁的一辆埃斯塔费特牌面包车里，以非常小的角度向开过来的车辆射击。

据巴斯蒂安·蒂尼的计算，等到前面一辆车开到和面包车并排的地方时，应该有一百五十颗子弹穿过那辆车。等到总统的汽车被迫停下的时候，第二组“秘密军”成员就从一

条小街拥出来，以近距离猛扫保安警察的摩托车。两个小组再花几秒钟时间把总统一行人收拾完毕，然后奔向停放在另一条街上的三辆车逃走。

巴斯蒂安·蒂尼是这一伙人中的第十三名，担任放哨。到八点零五分时，各组都已进入阵地。在伏击地点朝巴黎的方向走一百米的地方，巴斯蒂安·蒂尼拿着报纸闲站在公共汽车站旁边。他挥动报纸就是向站在面包车旁的第一组的组长塞热·贝尼埃打出讯号，后者再把命令传给四肢伸开趴在他脚边草丛里的射击手。布格兰内·德·拉·托内将开车拦截警车，“瘸子”瓦坦手持冲锋枪坐在他旁边。

当刺客们在小克拉玛的路旁打开枪支的保险时，戴高乐将军的车队已驶过巴黎中心交通最繁忙的地区，来到了郊区较为开阔的街道。车速加到了每小时近六十英里。

当路上车辆渐稀时，弗朗苏瓦·马鲁扫了一眼手表；他意识到坐在背后那位老将军的急不可耐的心情，把车开得更快了。两名摩托车手被甩到了后面，只好跟在车队后面担任警卫。戴高乐一向不喜欢这种鸣锣开道、虚张声势的作法，所以总是要尽可能甩掉他们。车队就这样驶进了小克拉玛的勒克莱克大街。时间是下午八点十七分。

巴斯蒂安·蒂尼站在一英里以外的马路上，他正在经受他的重大错误所造成的恶果。但他当时并不知道，直到几个月以后，他才在死囚牢里从警察嘴里明白了个中奥秘。他在研究行刺时间表时，查对了日历，知道八月二十二日到八点三十五分才天黑，即使戴高乐的日程比平常晚了一些，也还有充裕的时间。戴高乐的确晚了。但是这位空军中校查看的是一九六一年的日历，而一九六二年的八月二十二日却在八点十分天就黑了。这二十五分钟改变了法国的历史。八点十八分，巴斯蒂安·蒂尼看到车队沿着解放大街以每小时七十英里的速度朝着他飞驰而来。他拼命地挥动报纸。

街对面一百米以外的地方，贝尼埃愤怒地努力透过朦胧夜色凝视着公共汽车站旁那模模糊糊的身影。“中校挥动了报纸没有？”他也不知在问谁。话音刚落，他就看到总统汽车那尖尖的车头闪过车站进入了眼帘。“射击！”他对脚边的人尖声叫道。他们开火时，车队已到了他们眼前，他们以九十度的角度，对一个以每小时七十英里速度驶过他们面前的活动目标射击。

汽车被十二颗子弹击中了，这说明刺客们的射击技术还真不错。大多数子弹是从后面打中雪铁龙轿车的。两个轮胎被击中了，虽然它们是自封式轮胎，但是气压的消失使开得很快的车子全靠前轮打滑，东倒西歪地向前冲去。正是这个时候弗朗苏瓦·马鲁救了戴高乐的命。

当最棒的射手、前外籍军团的瓦尔加把轮胎打破时，其他人则对准正在消失的后车窗倾泻他们的子弹。有几颗子弹穿过车身，一颗子弹打碎了后车窗，在离总统的鼻子只有几英寸之处擦了过去。坐在前座上的德·布瓦西厄上校转过身来对他的岳父母大声吼道：“趴下去！”戴高乐夫人低下头倒在她丈夫的怀里。将军冷冰冰地说：“怎么，又来了？”然后转身从车子后窗向外望去。

马鲁抓住震颤着的方向盘，慢慢地让车子滑行，同时柔和地逐渐把油门踩下去。雪铁龙牌轿车在一刹那间失去了动力之后，又重新往前冲向树林大街的交叉处，正是在这交叉处的一条横街上埋伏着第二组“秘密军”的成员。警卫车紧跟着马鲁的车尾巴，没有挨着一颗子弹。

布格兰内·德·拉·托内把车子引擎开着等在树林大街上，两辆来车的高速度使他显然只有两种抉择：进行拦截而自杀，让猛冲过来的金属体把他辗成碎片；或者立即合上离合器，连半秒钟也迟疑不得。他选择了后者。当他把车子开出横街，驶上和总统车队并行的路线时，他因晚了半秒而不能和戴高乐的座车并行，而是和神枪手保镖德儒戴和杜克雷警长的座

车并行。瓦坦把半个身子伸出右边的车窗，把冲锋枪的全部子弹倾泻在前面 DS 型轿车的后部，他从打碎的玻璃窗里可以看到戴高乐那高傲的侧影。

“这些白痴为什么不回击呀？”戴高乐生气地问道。德儒戴正在设法向相隔十英尺平行的那辆车的“秘密军”的刺客们射击。但是警察司机遮住了他的视线。杜克雷则在向司机大吼大叫，要他紧跟总统的座车。不一会儿，“秘密军”的车子落后了。两名摩托车警卫中有一名几乎因德·拉·托内突然冲出横街而从车上跌下来，这时两人都清醒过来，飞速向车队靠近。整个车队越过道路交叉处的环形路，继续向维拉库布莱行进。

在伏击地点，“秘密军”的成员已无暇自责，这要等到以后再说了。他们离开了行动用的三辆汽车，跳上了三辆撤退汽车，消失在渐渐降下的夜色里。

杜克雷警长通过车上的报话机和维拉库布莱通了话，把发生的情况简单地告诉了他们。十分钟后车队到达时，戴高乐将军坚持把车直接开到停机坪直升飞机等着的地方。车停下以后，军政官员蜂拥而上把车团团围住，打开车门把震惊的戴高乐夫人扶了下来。将军从另一边打得稀烂的车门里跨出来，抖掉了他西服领子上的玻璃碎片，没有理睬四周官员们慌张的慰问，绕过车子挽住他妻子的胳膊。

“来吧，亲爱的，我们回家去。”他对她说，最后对空军人员说出他对“秘密军”的结论：“他们射不准。”说完后，他扶着妻子进入了直升飞机，在她旁边坐下。德儒戴也上了飞机，他们动身去乡下度周末。

在柏油道路上，弗朗苏瓦·马鲁脸色灰白，坐在司机座上。右边的两个车轮最后已经散架，DS 型轿车就靠轮圈支撑着滑行。杜克雷对他轻轻地道贺了几句，他就去着手清理车子。

当世界各地的记者们都在对这次谋刺行动进行猜测，但苦于缺乏材料只好全凭个人猜想来写他们的专栏时，法国警察在

国家保安队的领导下，依靠保安总局和宪兵队的支持，展开了法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搜捕活动。它很快就发展成为这个国家规模空前的一次搜捕活动。这次活动仅次于以后进行的追捕另一个刺客的活动，这个刺客的情况至今尚未弄清，档案里用的名字仍然是他的代号“豺狼”。

他们在九月三日得到了第一个突破。和警察工作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这是通过一次例行的检查取得的成果。在里昂城南瓦朗斯镇外一条从巴黎通往马赛的主要大道上，警方的路障拦住了一辆坐着四个人的私家汽车。他们那天已让几百辆车停下来检查身份证了。这辆车子里有一个人没带身份证。他说他丢了。他和另外三人被带到瓦朗斯镇进行例行的查问。

在瓦朗斯弄清楚了情况，车里的另外三个人和那个人没有关系，只是让他搭了一段车。三人释放了。取了第四个人的指纹，送往巴黎，以核对一下他说的姓名是否属实。十二个小时以后，答复来了：指纹属于一个二十三岁的外籍军团逃兵，他据军法被控有罪。但是他说的姓名倒很正确：皮埃尔·德尼·马加德。

马加德被带往里昂的司法警察区分部。马加德在接待室等候审讯时，一个看守他的警察开玩笑地说：“喂，小克拉玛是怎么回事？”

马加德无奈地耸了耸肩回答道：“好吧，你想知道什么呢？”

马加德共“唱”了八个小时，惊呆的警官听着，速记员的笔飞舞着，记了一本又一本的记录。最后，他把小克拉玛的每一个参加者的姓名都说了出来，还有其他九个人，有人在策划期间担任了某些次要任务，有些人帮助搞了器械。一共二十两个人。警察开始了追捕，这次他们知道该捉谁了。

最后只有一个人逃脱了，直到今天也没有捉到。乔治·瓦坦逃掉了，估计和大多数“秘密军”的首领们一起住在西班牙